

第五章

探討女性在囚人士的 希望感與精神健康關係

麥慧明博士¹、何敏賢教授²、李穎玲女士³、鮑家欣女士³

¹ 懲教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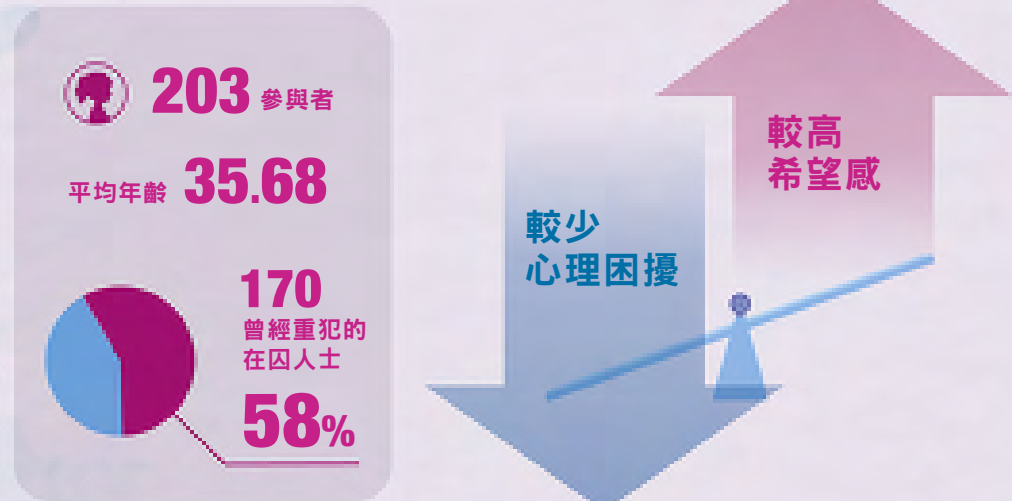
² 香港城市大學心理學教授

³ 懲教署臨床心理學家

備注：本文在2020年於Criminal Behaviour and Mental Health刊登。
是次重印已獲批准。



結果：有203名女性在囚人士參與是次研究，年齡介乎21 - 67歲不等，平均年齡為35.68歲，超過一半為曾經重犯的在囚人士(170名，佔58%)。整體而言，若她們有較高的希望感，其心理問題徵狀亦會較輕微。正面注意偏向是與較高希望感及較少心理困擾有關聯，相反，負面注意偏向則與較低希望感及較多心理困擾有關係。在統計模型所見，注意力偏向似乎是希望感與心理困擾兩者關係之中的中介因素。



結論：是次對女性在囚人士的研究與過去針對非在囚人口的研究結果一致。這表示，調整注意力方式的治療乃值得研究，它幫助這弱勢群體提高希望感和減少心理困擾徵狀，甚至有助減少她們的傷害行為。

摘要

背景：過去的研究指出，有較高希望傾向認知的非在囚人士，其心理問題徵狀會較少，並證明注意偏向在這兩者關係中發揮了中介效應。至於在囚人士的情況如何，則尚待探索。

目的：我們的研究旨在調查女性在囚人士的希望傾向認知，與慣性注意力處理方式和心理困擾之間的關聯。我們假設女性在囚人士有較高程度的希望感，是與在周圍環境中較多關注正面訊息及較少關注負面訊息有關，從而令她們出現抑鬱、焦慮和壓力徵狀的程度有所降低。

方法：我們以橫向研究的方法，招募被轉介接受心理服務而自願參與研究的女性在囚人士。參與者需獨立完成一組自我評估量表，從而量度她們的希望感、對正面和負面訊息的關注程度，以及焦慮、壓力和抑鬱等徵狀。

引言

監禁被視為一種典型的創傷經歷 (Elisha, Idisis, & Ronel, 2012; Levenson & Willis, 2019)。形成這種情況的環境因素包括：行動受限制、權威人士在場、空間有限、因保安考慮而導致減少隱私和提高警覺，這都可能增加創傷相關徵狀和無望感的風險 (Miller & Najavits, 2012)。

Sykes (1958) 歸納出在囚人士因五類缺乏而引致的壓力：(1) 商品及服務；(2) 自由；(3) 異性關係；(4) 自主權，和 (5) 安全感。他認為這些缺乏構成「在囚的痛苦」。在這些類別中，最常被提到的適應困難是與家人和朋友的分離 (Zamble & Porporino, 1988)。有指，女性在囚人士比男性在囚人士更容易出現精神健康問題 (James & Glaze, 2006)。女性在囚人士較男性在囚人士更普遍出現抑鬱、焦慮和自殘行為 (Bloom et al., 2003)。針對女性在囚人士的研究指，她們與男性有不同的心理需要，部分原因與她們過去曾受到情感、身體和性方面的創傷有關，部分原因則來自她們的育兒責任所產生的壓力 (LeClair, 1990)。此外，女性在囚人士的自殺率亦高於社區上其他可比擬的群組，這表明一般的在囚經歷不但可能觸發她們已存在的傾向，也有可能增加她們以自毀解決問題的機會 (McDermott, 1991)。因此，有必要確定影響女性在囚人士心理壓力背後的相應保護及風險因素。

希望傾向認知

希望感是一種正向認知，它包含了三個元素：(1) 目標；(2) 目標策略路線的相關思考，以及(3) 意志力相關的思考，即達至目標的動力 (Snyder et al., 1991)。Snyder 的希望模型提出，人們的行為是由目標所導向，人亦因而起動和堅持行動去達至目標。

Martin 和 Stermac (2010) 發現，在懲教院所中，當人的希望感水平越低，他們的重犯風險便越高；犯罪是因為他們選擇了不恰當的策略路線思考，以及缺乏意志力思考。如此，希望感可以被視為一個保護因素，以降低重犯風險；這可能促進更生人士取得支持和成功的機會，讓他們朝著正面目標而努力 (Moulden & Marshall, 2005)。從癌症患者和殘障人士的經驗可見，保持希望認知的人會有較強的免疫力，和較少出現抑鬱或焦慮 (Elliott et al., 1991; Ho et al., 2010; Yuen et al., 2014)。此外，懷有希望的人傾向更積極地應對壓力，並較少使用逃避應對策略，即如社交孤立或迴避問題的方法 (Chang, 1998)。

Chang 和 DeSimone (2001) 以中介路徑模型更詳細研究希望傾向認知與抑鬱之間的關係，從中發現希望感水平對抑鬱徵狀的嚴重程度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此，進而可以提問的就是有何額外因素可以在希望感與困擾之間發揮中間作用，而其中一個可能的因素是注意偏向——即偏向關注身邊正面刺激或負面刺激的慣性傾向。(MacLeod, Mathews & Tata, 1986; MacLeod & McLaughlin, 1995)。

注意偏向

根據 Macleod 及其同事所提出的情緒一致性理論 (MacLeod et al., 1986; MacLeod & McLaughlin, 1995)，人們是傾向看重及優先接收與自己情緒狀態一致的資訊。普遍認為無論是否達到病態程度，焦慮的人士都會選擇性地關注其身邊帶威脅性的訊息 (Bar-Haim et al., 2007)。同樣，有抑鬱情緒的人經常對自己抱有高度情緒困擾的態度和信念，此舉會控制了他們的訊息處理和專注力，最終可能會增加負面情緒 (Garland et al., 2010)。

有證據顯示，偏向負面注意威脅和攻擊的人，會有更高的犯罪風險 (Brugman et al., 2016; Domes et al., 2013)。例如，Brugman et al. (2016) 一項以69名男性在囚人士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對威脅和攻擊這些負面訊息有較高關注，並較少關注如快樂面孔這正面訊息的人士，會更常使用攻擊性的言語。因此，減少負面注意偏向，可能會減少心理困擾 (Browning et al., 2012)。可是，目前有關正面注意偏向的研究較少 (Lau & Waters, 2017)。基於擴展和建構模型，Wadlinger 和 Isaacowitz (2011) 提出正向情感會增加個人對正面訊息的選擇性偏好，這種「保護性偏好」讓人對正面訊息更敏銳，從而能夠享受更好的心理健康，減少焦慮和抑鬱 (Levens & Gotlib, 2010)。

在非犯罪人口之中，認知處理方式如注意力，已被證實為希望傾向與心理問題徵狀，包括抑鬱和焦慮之間的中介因素 (Chan et al., 2011; Yuen et al., 2014)。更高的希望感水平，與更正面的慣性關注偏向有關，進而減少心理問題徵狀 (Lau & Waters, 2017)。最近一項針對青少年的研究 (Yeung et al., 2015) 發現，關注正面訊息，能有利於調節希望感、主觀幸福感、焦慮、抑鬱，以及人際關係困難之間的關係。據我們所知，從未有研究探討於在囚人士當中，注意偏向於希望感與心理困擾之間，是否有著潛在的中介作用。

有見及此，我們的研究旨在探討女性在囚人士的希望傾向認知，與慣性注意力處理方式，以及心理困擾的關係。具體而言，我們的研究問題如下：

- (1) 香港女性在囚人士中，希望傾向與心理困擾有何關係？
- (2) 注意偏向能否在以上關係中發揮中介作用？

在本研究中，「心理困擾」一詞將代表抑鬱、焦慮和壓力等徵狀的總和，而「希望」則代表意志力思考與目標策略路線思考的總和。我們假設，希望感水平較高的女性在囚人士會慣性地更關注正面訊息，以及較少關注周遭的負面訊息，因此而較少出現抑鬱、焦慮和壓力等徵狀。

方法

研究通過香港懲教署的倫理審批。

研究對象及程序

參與是次研究的女性在囚人士是從羅湖懲教所招募，這裏亦是收容香港大部份女性在囚人士的院所。所有參與者都是由懲教所職員轉介到該院所的心理組。轉介原因有多方面，比如人際衝突、情緒問題、適應問題等，她們都獲邀參加這項研究。但如有不會讀寫、有嚴重干擾行為問題，和處於未穩定的精神病狀態之下的女性在囚人士，將不會參與是次研究。所有參與者均以書面形式作知情同意。參與者亦會先完成心理測試，包括一些自我報告測量和社會人口特徵統計問卷。發放及收集問卷的過程由院所中的心理組職員負責，他們均是臨床心理學家的助理，具備心理學知識，並接受過臨床心理學家提供的培訓。

量表

中文版成人希望量表 (Chinese version of the Adult Hope Scale) (Ho et al., 2010) 評估希望傾向，當中有12題自行填寫的表單，其中四個項目構成意志力次量表，而其他四個項目加起來給出目標策略路線次量表分數。其餘四項為干擾元素題目。每位參與者都要根據李克特八級量表填報，評估自己在每項目中當時所屬的情況 (1= 絕對錯誤, 8= 絕對正確)。意志力和目標策略路線兩項各有次量表；總希望得分 (希望總分：範圍 1-64) 是將意志力和目標策略路線兩項次量表的得分相加來計算，以表明整體的希望傾向。越高得分代表越高水平的希望傾向。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中，意志力 = 0.70、目標策略路線 = 0.76，以及希望總和為 0.81。

正面／負面注意偏向量表 (中文版8-短版) (The Chinese 8-item short form of the 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 (Chan et al., 2011) 是用於量度正負面訊息的意識傾向 (Noguchi et al., 2006)。其下兩個次量表，即關注正向訊息次量表 (API)，以及關注負面訊息次量表 (ANI)，用以量度參加者對正面及負面訊息的注意力偏差。量表中每條問題均以李克特五級量表評分 (1 = 非常不切合我, 5=非常切合我)。更高得分代表對正面或負面訊息有強烈傾向。本研究的內部一致性屬良好 (API α 0.77; ANI α 0.71)。

中文版情緒自評量表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用以量度人們的心理困擾 (Lovibond & Lovibond, 1995)。它包括三個次量表——抑鬱、焦慮及壓力，各有7條問題 (Antony et al., 1998; Henry & Crawford, 2005)。參加者以李克特四級量表填報 (0 = 並不適合我, 3 = 非常/經常適合我)，就過去七天情況來回答各問題自己所屬的程度。情緒自評量表的總得分反映出當事人的心理困擾情況 (總分會由0-42分)。該量表及各次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在本研究中均屬高水平 (抑鬱 α 0.88, 焦慮 α 0.85, 壓力 α 0.85, 情緒自評總量表 α 0.94)。

分析計劃

描述性的統計數據有助了解研究對象的概況。使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和皮爾森相關分析，來檢視人口統計中的變數和心理測量之間的關係。SPSS PROCESS macro則用作建議模型的中介分析 (Hayes, 2013)，當中會將希望總分作為自變量，情緒自評量表總分則為因變量，正負注意力偏差作為中介。該程序最近已獲推薦用作測試中介，因為它提供了比因果步驟方法更高的統計檢定力 (Baron & Kenny, 1986)。

結果

樣本描述

203位參與的女士，年齡介乎21 - 67歲，平均年齡為35.7(標準差[SD]為9.8)。她們的服刑期由1 - 240個月不等，平均多於54個月(實為54.34, 標準差：45.80)。其他資料包括教育程度及罪行類別，詳見表1。參與者當中的117名(即58%)曾在懲教院所服刑。有96名(47%)參與者報告在此監禁前曾接受精神科服務，其中的66名(32.5%)接受過精神科醫生的正式診斷，包括抑鬱症和焦慮症。

表 2 是按曾否有精神科診斷來將研究參與者分組，並羅列兩組各項統計分析的平均數及標準差。獨立樣本 t 檢驗分析顯示，作為一個群體，被診斷有精神病的參與者，表現出較低的正面注意偏向 ($t(201) = 2.07, p = 0.04, \text{Cohen's } d = 0.31$) 和較高的總心理困擾水平 ($t(201) = -2.30, p = 0.02, d = 0.34$)。至於首次入獄，和多次入獄的女性在囚人士相比，在診斷上沒有顯著差異。

與希望傾向的相關性

表 3 顯示了年齡、教育和刑期等因素，與希望感、注意偏向，和精神健康等評分範疇之相關性。從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可見，年齡與整體的希望傾向呈輕微正面關係 ($r = 0.18, p = 0.01$)。同樣地，希望評分與正面 ($r = 0.19, p = 0.01$) 及負面 ($r = -0.27, p < 0.001$) 訊息注意偏差評分也呈現輕微但顯著的相關性。換言之，較年長的女性在囚人士傾向有較高希望感水平，較多的正面訊息注意偏向，及較少的負面訊息注意偏向。數據顯示希望傾向與所有心理學上的變數之間，出現了顯著的相關性。總括而言，較高希望感水平與較少心理困擾、較少負面注意偏向，和更多正面注意偏向等都存在相關性。最後，在負面注意偏向和心理困擾之間，發現有強烈的正相關性 ($r = 0.55, p < 0.001$)；在正面注意偏向和心理困擾之間，也發現同樣有顯著的負相關性 ($r = -0.47, p < 0.001$)。

表1

參與研究的香港在囚女士的社會人口特徵

	人數	%
教育程度		
幼稚園或以下	1	0.5
小學	20	9.9
中學	164	80.8
大學	11	5.4
碩士或以上	3	1.5
其他	4	2.0
就業情況		
全職	52	25.6
兼職	15	7.4
失業	66	32.5
沒工作能力	3	1.5
家庭主婦或全職學生	32	15.8
退休	5	2.5
非法業務	29	14.3
使用前精神科/心理服務^a	97	47.8
使用前精神病診斷^b	66	32.5
使用前精神科藥物^a	83	40.9
有定罪紀錄^a	117	57.6
主要所犯罪行類型		
勒索	2	1.0
串謀詐騙	13	6.4
可公訴罪行	3	1.5
毒品有關(如管有, 販運)	115	56.7
欺詐, 誘導他們犯罪	7	3.4
誤殺	2	1.0
騙取財物/服務	4	2.0
搶劫	2	1.0
性罪行	3	1.5
盜竊	28	13.8
涉未完稅商品	2	1.0
使用偽造的旅行證件/文書/法定聲明	3	1.5
使用他人身份證	2	1.0
暴力相關(如傷人、毆打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3	1.5
其他	12	5.9

註：

人數 = 203. 參加者平均年齡為35.7歲 (標準差 = 9.8) 平均刑期為 54.3月 (標準差 = 45.8)。

a 參加者回答「是」的數目及百分比。

b 參加者回答曾接受精神科/心理服務的數目及百分比 (人數 =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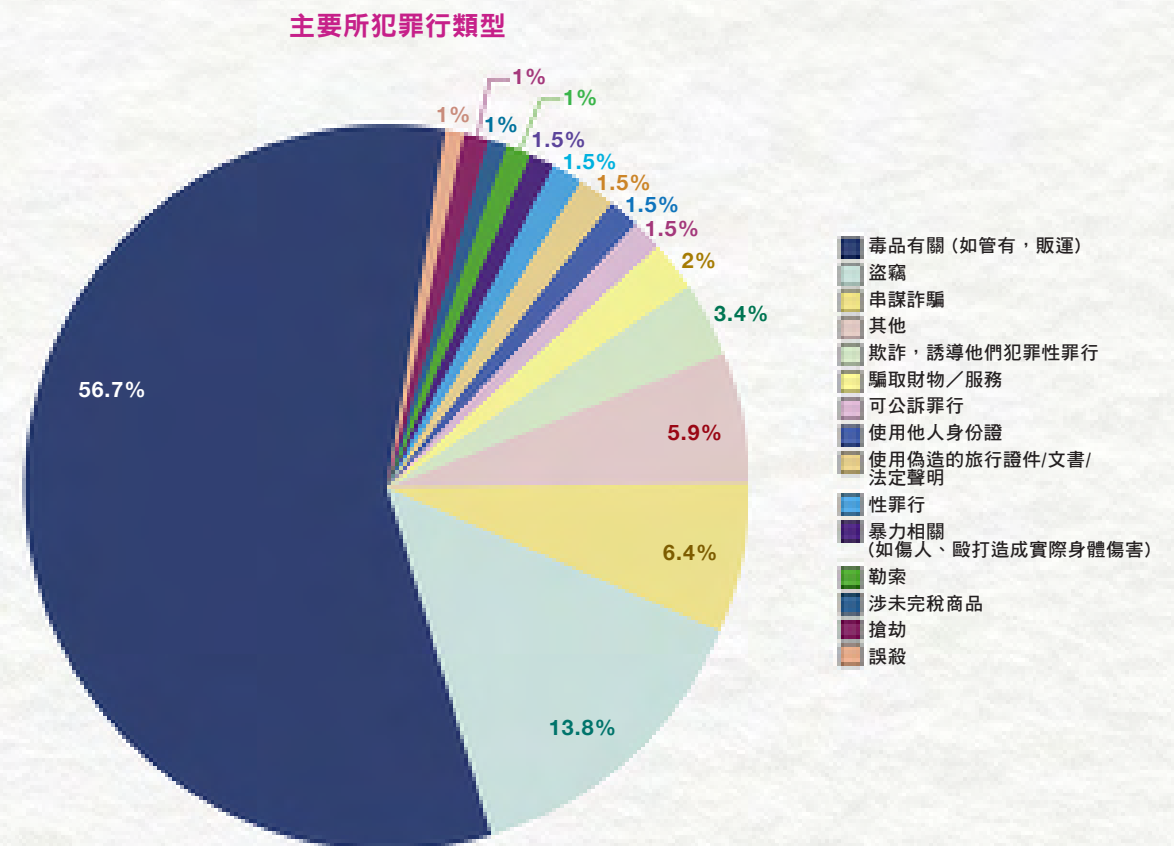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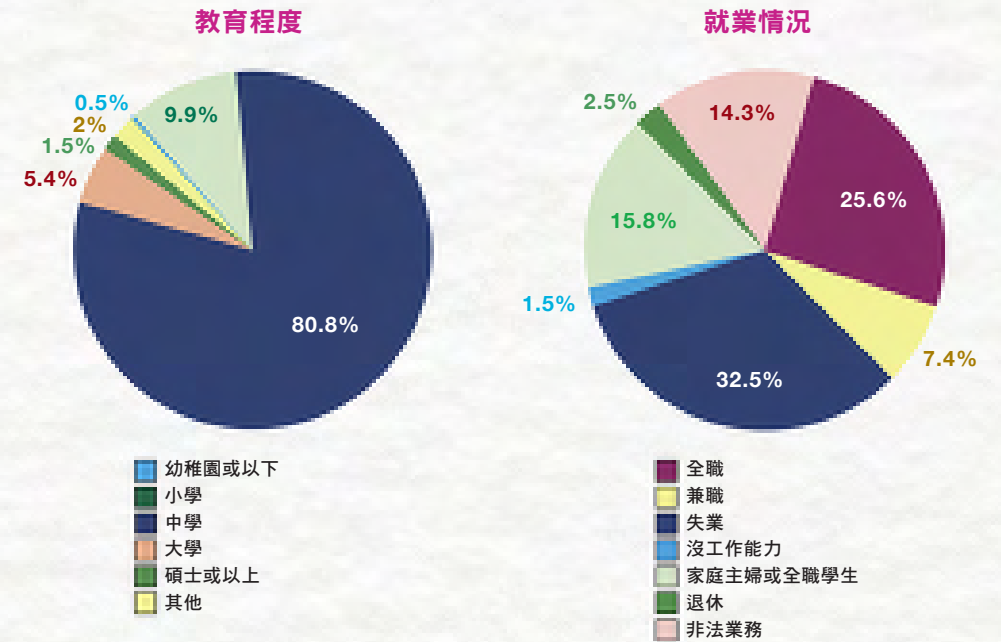


表2

量度希望、注意偏向與精神科診斷的關係

	精神科診斷 有 (人數 = 66)		沒有 (人數 = 137)		t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成人希望量表 AHS					
意志力	16.12	6.62	17.28	6.99	1.12
達至目標的途徑	17.65	6.69	18.69	7.37	0.97
希望總分	33.77	12.23	35.97	13.60	1.11
正及負面訊息 關注量表 APNIS					
正面注意力 偏誤次量表得分	13.17	3.18	14.13	3.09	2.07*
負面注意力 偏誤次量表得分	15.79	3.64	15.38	3.39	-0.78
情緒自評量表					
抑鬱	17.52	11.52	14.12	10.38	-2.11*
焦慮	17.61	10.87	13.27	8.85	-3.03*
壓力	21.21	10.40	19.42	10.13	-1.17
情緒自評量表總分	56.33	29.58	46.80	26.72	-2.30*

註：

希望總分 = 成人希望量分總分; API = 正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 ANI = 負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 DASS 總分 = 情緒自評量表總分。

縮寫: 成人希望量表(AHS); 正及負面訊息關注量表(APNIS); 情緒自評量表(DASS)。

*p < 0.05.

進一步分析與心理困擾相關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

分析以心理壓力為因變數，然後應用PROCESS macro (Hayes, 2013)，去測試各項變數在二元水平中如何互動。希望傾向是一個獨立變數，正負面注意偏向是可能的中介因素，而年齡和精神病學診斷則是共變數。

在分析的過程中，一系列的簡單線性迴歸分析被應用，以建立這些變數之間的零階關係。首先，心理困擾和希望傾向之間的關係得到顯著關聯的證明。(β = -0.70, 95% CI [-0.99, -0.40] SE = 0.15, t = -4.62, p < 0.001)。此外，希望傾向和正面注意偏向之間的關係(β = 0.14 95% CI [0.11, 0.17], SE = 0.01, t = 10.52, p < 0.001)，以及希望傾向和負面注意偏向之間的關係(β = -0.12, 95% CI [-0.15, -0.09] SE = 0.02, t = -7.42, p < 0.001)，亦得到顯著關聯的證明。隨後的簡單線性迴歸分析，又進一步證實心理困擾和正面注意偏向之間的顯著關聯(β = -1.60, 95% CI [-2.75, -0.46] SE = 0.58, t = -2.76, p = 0.01)以及心理困擾與負面注意偏向的重要關聯(β = 3.01, CI [2.06, 3.96] SE = 0.48, t = 6.25, p < 0.001; 表 4)。

當正負面注意偏向，在複迴歸分析中作為中介因素，希望傾向和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大幅下降，但關係仍然顯著(前者: API: β = -0.23, 95% CI [-0.41, -0.07] SE = 0.09) / (後者: β = -0.36, 95% CI [-0.56, -0.21] SE = 0.09)。這些結果顯示，注意偏向在某程度上影響了希望傾向和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圖 1)。



表3
香港女性在囚人士的人口特徵與各心理問題變數之間的關係

變數	1	2	3	4	5	6	7
1. 年齡	-	-	-	-	-	-	-
2. 教育	-0.27***	-	-	-	-	-	-
3. 刑期 (以月計)	-0.13	-0.17*	-	-	-	-	-
4. 成人希望總表 總評分	0.18**	-0.05	-0.06	-	-	-	-
5. 注意力量度 (正面資訊)	0.19**	-0.90	0.04	0.62***	-	-	-
6. 注意力量度 (負面資訊)	-0.27***	0.00	0.03	-0.49***	-0.27***	-	-
7. 情緒自評量表 總分	-0.07	0.08	-0.03	-0.61***	-0.47***	0.55***	-

註：
(1) 成人希望量表及情緒自評量表的次量表總分在此並不包括，只會在它們用於計算中介分析時才包括。
縮寫: API = 正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ANI, = 負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DASS = 情緒自評量表 *p < 0.05, **p < 0.01, ***p < 0.001.



表4
直接及間接影響的複迴歸分析測試結果

	情緒自評量表			情緒自評量中希望的中介效應		
	β	SE	95% CI	β	SE	95% CI
HS total	-0.70***	0.15	[-0.99, -0.40]	-	-	-
API	-1.60**	0.58	[-2.75, -0.46]	-0.23**	0.09	[-0.41, -0.07]
ANI	3.01***	0.48	[2.05, 3.96]	-0.36***	0.09	[-0.56, -0.21]

$R^2 = 0.50, F(5,197) = 38.74, p < 0.001$

註:
Hope Total = 成人希望量表總分;
API = 正面訊息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
ANI = 負面訊息注意力偏差次量表得分
DASS Total = 情緒自評量表總分數

縮寫: API, 正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ANI, 負面注意力偏差次量表, DASS = 情緒自評量表總得分
p < 0.01, *p < 0.001.



討論

有較高希望感水平的女性在囚人士，會出現較少的抑鬱徵狀，這與我們起始的研究假設一致，也與過去其他相關研究的結果一致 (Elliott et al., 1991; Ho et al., 2010; Yuen et al., 2014)。這顯示希望傾向認知有可能成為在囚女性處理心理困擾的一個保護因素。對女性來說，監禁的經歷不單帶來沉重壓力和沮喪，可能更有一種不可預測未來的感覺 (Kraemer et al., 2009)。在囚女性出現自殘和自殺行為往往與負面情緒狀態有關，因此需要專為她們制訂新策略。Van Wormer (2010) 提出，藝術療法是其中一種創新且顧及性別需要的方法，它旨在幫助和鼓勵在囚女性透過自我表達方式來抒發創傷，從而得著更多能力。Mak et al., (2016) 亦帶來了一種開創性的方法，結合認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理治療，以助減低女性在囚人士的心理困擾，並提高其心理健康。他們的工作融入了加強希望認知和正向覺察的治療，從而達到改善注意偏向的目的。此外，Riley et al. (2019) 指出，建基於靜觀和接納為本的群體治療有助提高女性在囚人士的覺察和接納能力，並減低她們的抑鬱、焦慮和由心理引起的生理疾病。

大多數研究主要聚焦於女性青少年在囚人士或女性吸毒者的治療 (例如，Roberts-Lewis et al., 2010)；對於懲教院所內沒有濫藥背景的成年女性，實證為本的治療計劃也是不足夠。因此，制定更多針對女性在囚人士的治療計劃定必需要。

我們的研究顯示，有些女性對未來仍抱有希望的會較少出現抑鬱或焦慮。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能否在懲教院所內為在囚女性培養出希望傾向認知。在香港，被囚禁的女性人數從 1986 年的 944 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3,484 人；相比之下，同期的男性在囚人士，則從 9,718 人減少到 7,998 人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6)，由此可見，在懲教院所內為女性在囚人士維持希望感等正面情緒狀態的工作變得越來越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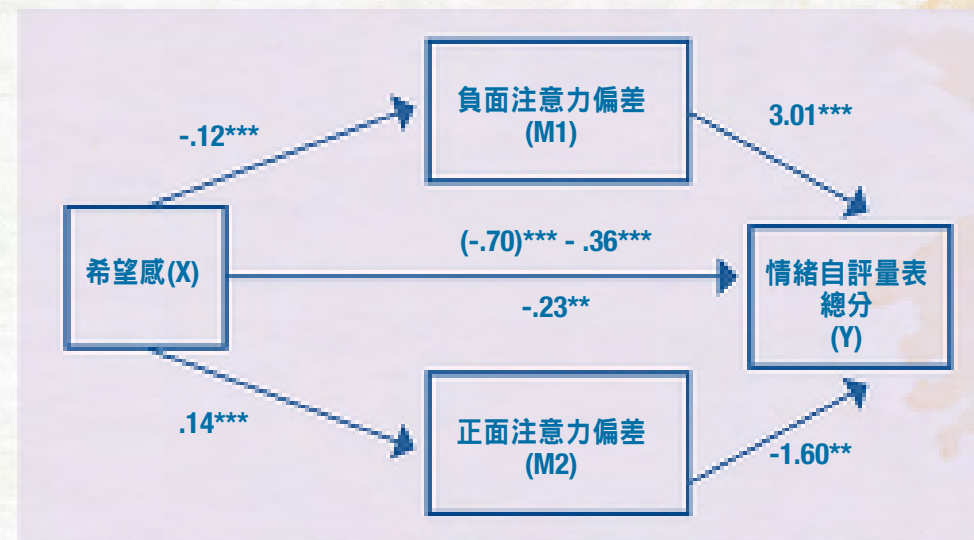


圖 1 在希望總分及情況量表總分之間正負面注意力偏差的中介模型。
非標準化回歸係數呈現的數值，基線係數則以在 () 內。
p < 0.01, *p < 0.001.

我們的研究結果還顯示，在希望傾向和心理困擾之間的關係中，有一部分受正負面信息注意偏向所影響。除了已知道正負面注意偏向在希望傾向和心理困擾之間的中介效應外，這次研究進一步闡述了希望傾向在預防心理困擾中的潛藏機制。換句話說，滿有希望的想法可能使注意力從負面轉向正面，進而減少負面的情感狀態。較高的希望傾向標示著更目標導向的思維，鼓勵追求目標。以實證為本的希望治療在其他社群，例如面對基因結腸癌篩查的人士，已發展成熟 (Ho et al., 2012)。我們的研究結果，提供了理論支持去發展同類的希望治療，以提高女性在囚人士的希望感，從而減少她們的心理困擾。

此外，有證據顯示，注意偏向越負面，心理困擾就越大；相反，注意力偏向越正面，心理困擾就越低。我們的研究看到，之前針對其他群組的研究中發現，負面情緒呈螺旋式下降，和正向情緒呈螺旋式上升的可能性（Disner et al., 2011; Garland et al., 2010; Kellough et al., 2008）。對於接收一些情感的資訊，若出現偏向的認知過程，負面情緒便不住延續和出現惡性循環，反之亦然。通過例如擴闊注意力和正面重估等認知過程，有可能打破這種局面，得以在減壓的同時，亦觸發正面情緒的良性循環。因此，除了針對增加希望傾向的治療外，其他能減少負面注意偏向，和增加正面注意偏向的治療，都可能對女性在囚人士有所裨益（Bar-Haim, 2010），所以女性懲教院所的臨床心理學家可考慮安排希望治療，以及改善注意力偏差的培訓。

儘管其他樣本的特徵分析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但識別人口統計的風險因素可能有助臨床心理學家篩選心理困擾風險較高的在囚人士，並製定適當的治療措施。簡而言之，在是次研究的女性在囚人士樣本中，發現了一些人口統計和犯罪因素，與心理困擾有關。年齡和希望傾向，以及注意偏誤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一個合理的解釋是，青少年在囚人士還沒有發展出一種能力來應對和適應懲教院所中被囚的感覺和相關經歷。一項針對南非年輕女性的研究指出，希望感也與學校成績、酒精使用和家庭支持等變數有顯著關係（Abler et al., 2017）。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具有較佳學業成績、較少飲酒和更多家庭支持的年輕女性，會有較高的希望感水平。雖然這些發現未足以推說到在囚人士身上，但這闡明了考慮其他變數的重要性。在篩查階段中，為女性在囚人士識別更多風險和保護因素，及早識別那些希望感較低的人士，然後進行相關治療，甚或可能會挽救生命，值得考慮推行。



局限性

我們的研究有一些局限性，主要在於它是一個橫向研究，所以雖然我們可以從統計分析中推斷出路徑，但我們不能看到其中的原因及影響。然而，現在有確切的證據表明，這是一個值得通過縱向和干預研究去進一步測試的模型。注意偏向作為調節變數的可能性，值得被更充分的探討。其次，我們只調查已判刑的女性在囚人士，因此對於在獄中候審的女性、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未入獄的女性，以及所有男性在囚人士，他們的希望傾向、注意偏向和精神健康之間的任何關係，仍然未能確定。此模型似乎很可能適用於這些群組，因為它適用於長期有壓力但完全不同的群體，例如患癌病人，但需要更多針對具體情況的研究。第三，我們的樣本僅包括被轉介接受心理服務的女性，研究對象會可能偏向於困擾和負面注意偏向。若將來我們以具完整代表性的樣本去作研究，便可以更了解她們的精神狀態。

臨床意義

希望治療可以提供目標設定、尋找方法和採取步驟的技巧，以實現目標同時亦訓練保持動力和注意力，以提高對環境中正面因素的覺察，幫助女性在囚人士管理她們負面的想法以及面臨挑戰和困難時的擔憂。此舉，可一定程度地減少焦慮和抑鬱，從而提高這個弱勢群體在懲教院所中的精神健康。

參考資料

- Antony, M. M., Bieling, P. J., Cox, B. J., Enns, M. W., & Swinson, R. P. (1998).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42-item and 21-item versions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in clinical groups and a community samp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0*(2), 176. <https://doi.org/10.1037/1040-3590.10.2.176>
- Bar-Haim, Y., Lamy, D., Pergamin, L.,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 Van Ijzendoorn, M. H. (2007). Threat-related attentional bias in anxious and nonanxious individuals: A meta-analytic stud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3*(1), 1.
- Bar-Haim, Y. (2010). Research review: Attention bias modification (ABM): A novel treatment for anxiety disorder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1*(8), 859–870. <https://doi.org/10.1111/j.1469-7610.2010.02251.x>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1.6.1173>
- Bloom, B., Owen, B., & Covington, S. (2003). *Gender-responsive strategies: Research practice and guiding principles for women offender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Institute of Corrections.
- Browning, M., Holmes, E. A., Charles, M., Cowen, P. J., & Harmer, C. J. (2012). Using attentional bias modification as a cognitive vaccine against depression. *Biological Psychiatry, 72*(7), 572–579.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12.04.014>
- Brugman, S., Lobbestael, J., von Borries, A. K., Bulten, B. E., Cima, M., Schuhmann, T., ... Arntz, A. (2016). Cognitive predictors of violent incidents in forensic psychiatric inpatients. *Psychiatry Research, 237*, 229–237.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6.01.035>
- Chan, M. W. C., Ho, S. M. Y., Tedeschi, R. G., & Leung, C. W. L. (2011). The valence of attentional bias and cancer-related rumin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Psycho-Oncology, 20*(5), 544–552. <https://doi.org/10.1002/pon.1761>
- Chang, E. C. (1998).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appraisal of a stressor: Controlling for confounding influences and relations to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adjust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4), 1109.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4.4.1109>
- Chang, E. C., & DeSimone, S. L. (2001). The influence of hope on appraisals, coping, and dysphoria: A test of hope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2), 117–129. <https://doi.org/10.1521/jscp.20.2.117.22262>
- Disner, S. G., Beevers, C. G., Haigh, E. A., & Beck, A. T. (2011). Neural mechanisms of the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2*(8), 467–477. <https://doi.org/10.1038/nrn3027>
- Domes, G., Mense, J., Vohs, K., & Habermeyer, E. (2013). Offenders with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show attentional bias for violence-related stimuli. *Psychiatry Research, 209*(1), 78–84. <https://doi.org/10.1016/j.psychres.2012.11.005>
- Elisha, E., Idisis, Y., & Ronel, N. (2012). Window of opportunity: Social acceptance and life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imprisoned sex offender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7*, 323–332.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2.03.004>
- Elliott, T. R., Witty, T. E., Herrick, S., & Hoffman, J. T. (1991). Negotiating reality after physical loss: Hope, depression and disa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4):608–61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1.4.608>
- Garland, E. L., Fredrickson, B., Kring, A. M., Johnson, D. P., Meyer, P. S., & Penn, D. L. (2010). Upward spirals of positive emotions counter downward spirals of negativity: Insights from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on the treatment of emotion dysfunctions and deficits in psychopat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0*(7), 849–864.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0.03.002>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and London: Guilford Press.
- Henry, J. D., & Crawford, J. R. (2005). The short-form versi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21): Construct validity and normative data in a large non-clinical sample. *British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4*(2), 227–239. <https://doi.org/10.1348/014466505X29657>
- Ho, S. M. Y., Ho, J. W., Bonanno, G. A., Chu, A. T., & Chan, E. M. (2010). Hopefulness predicts resilience after hereditary colorectal cancer genetic testing: A prospective outcome trajectories study. *BMC Cancer, 10*(1), 279. <https://doi.org/10.1186/1471-2407-10-279>
- Ho, S. M. Y., Ho, J. W. C., Pau, B. K.-y., Hui, B. P.-h., Wong, R. S.-m., & Chu, A. T.-w. (2012). Hope-based intervention for individuals susceptible to colorectal cancer: A pilot study. *Familial Cancer, 11*, 545–551. <https://doi.org/10.1007/s10689-012-9545-3>
-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16). *Women and men in Hong Kong key stat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legco.gov.hk/yr16-17/english/panels/hs/papers/hs20170425cb2-1220-1-e.pdf>
- James, D. J., & Glaze, L. E. (2006).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prison and jail inmates*.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Kellough, J. L., Beevers, C. G., Ellis, A. J., & Wells, T. T. (2008). Time course of selective attention in clinically depressed young adults: An eye tracking stud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6*(11), 1238–1243. <https://doi.org/10.1016/j.brat.2008.07.004>
- Kraemer, S., Gately, N., & Kessell, J. (2009). *HoPE (Health of Prisoner Evaluation): pilot study of prisoner physic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ondalup, Australia: School of Law & Justice, Edith Cowan University.
- Lau, J. Y. F., & Waters, A. M. (2017). Annual Research Review: An expanded account of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risk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58*(4), 387–407. <https://doi.org/10.1111/jcpp.12653>
- LeClair, D. (1990). *The incarcerated female offender: Victim or villain*. Research Division, Massachusetts Division of Correction (October).
- Levens, S. M., & Gotlib, I. H. (2010). Updat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timuli in working memory in depres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9*(4), 654–664. <https://doi.org/10.1037/a0020283>
- Levenson, J. S., & Willis, G. M. (2019). Implementing trauma-informed care in correctional treatment and supervision. *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 28*(4), 481–501. <https://doi.org/10.1080/10926771.2018.1531959>

Lovibond, P. F., & Lovibond, S. H. (1995). The structure of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 with the Beck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ventorie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3), 335–343. [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00075-U](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00075-U)

MacLeod, C., Mathews, A., & Tata, P. (1986). Attentional bias in emotional disorder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95(1), 15.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95.1.15>

MacLeod, C., & McLaughlin, K. (1995).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mory bias in anxiety: A conceptual replicat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33(1), 1–14. [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E0004-3](https://doi.org/10.1016/0005-7967(94)E0004-3)

Mak, V. W. M., Ho, S. M. Y., Kwong, R. W. Y., & Li, W. L. (2016). A gender-responsive treatment facility in correction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2(4):1062–1079.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6667572>

Martin, K., & Stermac, L. (2010). Measuring h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54(5), 693–705.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09336131>

Mcdermott, K. (1991). Suicide and self-injury in prison: A literature review by Charles Iloy.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1(2), 201–202

Miller, N. A., & Najavits, L. M. (2012). Creating trauma-informed correctional care: A balance of goals and enviro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3(1), 17246. <https://doi.org/10.3402/ejpt.v3i0.17246>

Moulden, H. M., & Marshall, W. L. (2005). Hope in the treatment of sexual offenders: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hope theory. *Psychology, Crime and Law*, 11(3), 329–342.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0512331316361>

Noguchi, K., Gohm, C. L., & Dalsky, D. J. (2006). Cognitive tendencies of focusing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0(6), 891–910. <https://doi.org/10.1016/j.jrp.2005.09.008>

Riley, B. J., Smith, D., & Baigent, M. F. (2019). Mindfulness and acceptance-based group therapy: An uncontrolled pragmatic pre-post pilot study in a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 of female prison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 63(15–16), 2572–2585. <https://doi.org/10.1177/0306624X19858487>

Roberts-Lewis, A. C., Welch-Brewer, C. L., Jackson, M. S., Pharr, O. M., & Parker, S. (2010). Female juvenile offenders with HEART: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an intervention model for female juvenile offenders with substance use problems. *Journal of Drug Issues*, 40(3), 611–625. <https://doi.org/10.1177/002204261004000304>

Sykes, G. (1958). *The society of cap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C. R. (2002). Hope theory: Rainbows in the mi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13(4):249–2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304_01

Snyder, C. R., Harris, C., Anderson, J. R., Holleran, S. A., Irving, L. M., Sigmon, S. T., ... Harney, P. (1991). The will and the way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easure of hop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4):570–58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0.4.570>

VanWormer, K. (2010). *Working with female offenders*. 1. Aufl. (ed.). Hoboken, NJ: Wiley Web.

Wadlinger, H. A., & Isaacowitz, D. M. (2011). Fixing our focus: Training attention to regulate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5(1), 75–102. <https://doi.org/10.1177/1088868310365565>

Yeung, D. Y., HO, S. M. Y., & Mak, C. W. Y. (2015). Brief report: Attention to positive informatio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pe and psychosocial well-being of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42, 98–102.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15.04.004>

Yuen, A. N. Y., Ho, S. M. Y., & Chan, C. K. Y. (2014). The mediating roles of cancer-related rumin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hope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among childhood cancer survivors. *Psycho-Oncology*, 23(4), 412–419. <https://doi.org/10.1002/pon.3433>

Zamble, E., & Porporino, F. (1988). *Coping, behavior, and adaptation in prison inmates*. New York, NY: Springer-Verlag.